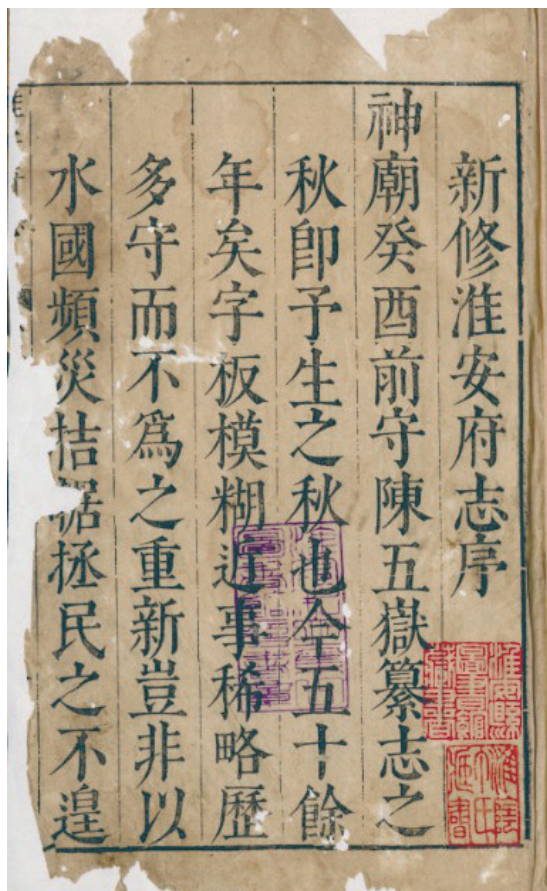


胡适利用《淮安府志》考定《西游记》作者

◎ 张乃格



天启《淮安府志》书影

吴承恩是《西游记》的作者，这在今天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常识。但在古代，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到底是谁却是一个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的复杂问题。主要有丘处机、李春芳、王阳明、朱鼎臣、吴承恩等好几种意见。直到1923年，胡适在鲁迅的帮助下，利用天启《淮安府志》的资料，才考定吴承恩是《西游记》作者的“正主”，此后逐渐为人们所知，并最终为社会广泛认同。

进一步推定李春芳就是《西游记》的作者。

李春芳（1510~1584）字子实，号石麓，世居句容县，后移居兴化。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扉页所署“华阳洞天主人校”，充其量只能说明《西游记》曾经其校订，并不能证明此书就是华阳洞主人撰著的。此其一。其二，历史上号华阳洞主者并不仅仅李春芳一人。有人就考证说，华阳洞主实际上是丘处机的号。另检杨廷福《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》，张皜也以华阳洞主为号，又张祥鸛号华阳洞叟、又号华阳洞，而号华阳山人者4人、华阳者7人，华阳散人、华阳逸者、华阳生、华阳馆者各1人。其三，仅凭《西游记》中一首所谓隐喻诗，就断定李春芳是《西游

现在存世最早的《西游记》版本，是明代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金陵世德堂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。此书不署作者姓名，只在扉页上题“华阳洞天主人校”。后来有人考证，华阳洞天主人实为李春芳。有人还根据《西游记》第九十五回诗：“缤纷瑞靄满天香，一座荒山倏被祥；虹流千载清河海，电绕长春赛禹汤。草木沾恩添秀色，野花得润有余芳；古来长者留遗迹，今喜明君降宝堂。”以为第四、五、六、七四句暗含“李春芳老人留迹”线索，与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卷首“华阳洞天主人”七字相互印证，

记》的作者，这如同编造所谓李白诗“北暮苍山兰舟四，京无落霞缀清川；奥年叶落缘分地，运水微漾人却震”，以此来说明李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预言了北京奥运之年（2008）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一样，根本就不靠谱。

二

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，丘处机著《西游记》的意见影响最大。

清康熙年间，奉道弟子汪澹漪将《西游记》笺评为《西游证道书》，第一次提出《西游记》的作者为丘处机。并不惜作假，托名元代文学家虞集写了一篇《西游记原序》放在全书的前面。因为虞集曾任《经世大典》总裁，《原序》还模仿虞集的口吻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余浮湛史馆，鹿鹿丹铅。一日，有衡岳紫琼道人，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，余与流连浹月。道人将归，乃出一帙示余，曰：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《西游记》也，敢乞公一序以传。”汪澹漪还在托名虞集《原序》的后面“配套”《丘长春真君传》和《玄奘取经事迹》附录两则，分别介绍丘处机的生平和玄奘大师取经的史实。果不其然，托名虞集的《原序》和两则附录环环相扣，彼此互证，终致三人成虎，三告投杼。自此之后，人们对此深信不疑，丘处机为《西游记》作者的意见风行于世。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古本《西游记》，清代共有7种版本，作者无一例外都署成丘处机。

丘处机（1148~1227）字通密，道号长春子，元登州栖霞人（今属山东省）。

认定丘处机为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有两个致命伤。第一，《西游记》屡次写到锦衣卫、司礼监、会同馆、东城兵马司等官制与官职，而这些官制、职官是明代出现的。丘处机是宋元之际人，由他创作的著作中怎么会出现明代的官制与职官呢？第二，诚然，丘处机写过一本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，但此《西游记》非彼《西游记》，二者风马牛不相及。清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，江苏嘉定（今属上海）著名学者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正统《道藏》中发现并抄出丘处机的《西游记》。此书全名“长春真人西游记”，只有2卷，由丘处机弟子李志常代为操刀，体裁是游记。主要内容是丘处机率领18弟子历时4年，远赴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所见所闻，包括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次对话。全书不足5万字，与百回本神话小说《西游记》实在是

“郛书燕说”。

三

王阳明即王守仁（1472~1529），字伯安，号阳明，明绍兴府余姚县人，古代著名思想家，陆王心学集大成者。说他是《西游记》的作者，却缺乏起码的证据。朱鼎臣字冲怀，广州人，一说江西临川人。晚明庠生。但他的著作实为《唐三藏西游释厄传》，全书10卷，共66回，并非流行于世的100回本《西游记》。这两种意见都不值一辩。

在《西游记》作者诸说中，吴承恩最为晚出而又最不受待见。

最早提出吴承恩为《西游记》作者的是吴玉搢的《山阳志遗》。该书卷四说：

天启旧志列先生（指吴承恩——笔者注，下同）为近代文苑之首，性敏而多慧，博极群书，为诗文下笔立成，复善谐谑，所著杂记几种，名震一时。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，及阅《淮贤文目》，载《西游记》为先生著。考《西游记》旧称为证道书，谓其合于金丹大旨，元虞道园（虞集）有序，称此书系其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。而郡志谓出先生手。天启时去先生未远，其言必有所本。意长春初有此记，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，如《三国志》本陈寿，而《演义》则称罗贯中也。书中多吾乡方言，其出淮人手无疑。

吴玉搢字藉五，号山夫，清淮安府山阳县（今淮安市淮安区）人。有关吴承恩为《西游记》作者的一段文字就出自这里。

时间稍晚，阮葵生在其《茶余客话》中响应吴玉搢，发表了类似意见，进一步肯定吴承恩为《西游记》的作者。

吴承恩（1504~1582）字汝忠，号射阳山人，明淮安府山阳县人。少有文名，屡试不第，直到年近50才补为岁贡生，曾任山西潞安通判、浙江长兴县丞、湖北荆王府纪善。天启《淮安府志》有传。

吴玉搢、阮葵生的依据都是天启《淮安府志》，也就是《山阳志遗》所说的“天启旧志”“郡志”。考天启《淮安府志》，明淮安知府宋祖舜修，东河船政同知方尚祖等纂，初刻于天启六年（1606）。全书24卷首1卷，全面又系统地记述了淮安府舆地、建置、秩官、学校、典礼、兵戎、贡赋、河防、选举、人物、艺文、丛纪等方面的历史。有关吴承恩的生平见于该书卷十六人物二《近代文苑》，有关吴承恩著

《西游记》的史料见于该书卷十九《艺文志一·淮贤文目》。

非常可惜的是，吴玉搢和阮葵生早在乾隆期间就提出了吴承恩对于《西游记》的著作权问题，但直到清朝灭亡，似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。直到1920年代，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。

四

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，鲁迅先生最早注意到吴玉搢、阮葵生的意见，并在其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七篇《明之神魔小说》明确提出：“探索旧志，知《西游记》之作者为吴承恩矣。”当时胡适正在进行《西游记》的研究，鲁迅便将掌握的资料抄给他，胡适如获至宝，主要凭借这些资料，在1923年2月写出《西游记考证》，后来发表在1923年第6期《读书杂志》上。其中说：

现承周豫才（指鲁迅）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抄给我，转录于下：

天启《淮安府志》十六《人物志》二《近代文苑》：吴承恩性敏而多慧，博极群书，为诗文下笔立成，清雅流利，有秦少游之风。复善谐剧，所著杂记几种，名震一时。数奇，竟以明经授县贰，未久，耻折腰，遂拂袖而归。放浪诗酒，卒。有文集存于家。丘少司徒汇而刻之。

又同书十九《艺文志》一《淮贤文目》吴承恩：《射阳集》四册，□卷；《春秋列传序》《西游记》。

康熙《淮安府志》十一及十二：与《天启志》悉同。

胡适先生还考证出，吴承恩大约生于正德之末（约1520），死于万历之初（约1580）。而“天启《淮安府志》修于天启六年，当西历1626，去吴承恩死时止有四五十年，自然是可靠的根据了”。并引吴承恩的《二郎搜山图歌》，进一步证明《西游记》确为吴承恩所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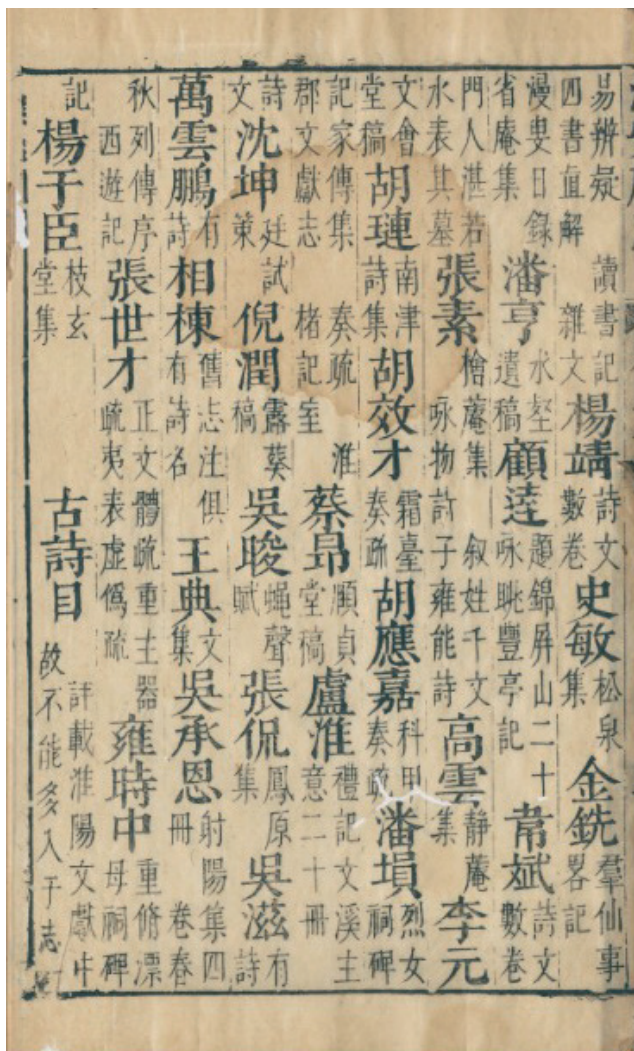
李在惟闻画山水（李在，明宣德时画家），不谓兼能貌神鬼。笔端变幻真骇人，意态如生状奇诡。少年都美清源公，指挥部从扬灵风。星飞电掣各奉命，蒐罗要使山林空。名鹰攫拿犬腾咭，大剑长刀莹霜雪。猴老难延欲断魂，狐娘空洒娇啼血。江翻海搅走六丁，纷纷水怪无留踪。青锋一下断狂虺，金锁交缠禽毒龙。神兵猎妖犹猎兽，探穴捣巢无逸寇。平生气

焰安在哉？爪牙虽存敢驰骤！我闻古圣开鸿蒙，命官绝地天之通。轩辕铸镜禹铸鼎，四方民物俱昭融。后来群魔出孔窍，白昼搏人繁聚啸。终南进士老钟馗，空向官闾啗虚耗。民灾翻出衣冠中，不为猿鹤为沙虫。坐观宋室用五鬼，不见虞廷诛四凶。野夫有怀多感激，无事临风三叹息：胸中磨损斩邪刀，欲起平之恨无力。救日有矢救月弓，世间岂谓无英雄？谁能为我致磨风，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？

此后，郑振铎、孙楷第、赵景深、刘修业等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，不断引证、申述，从此《西游记》的作者为吴承恩逐渐在学术界成为主流，几成共识，以后刊行的《西游记》作者均署为吴承恩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语言学家们又从方言学的角度，进一步证成这种意见。于是，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遂成为妇孺皆知的社会常识，以至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也署作“吴承恩原著”。



天启《淮安府志》书影



天启《淮安府志》书影

五

《西游记》为吴承恩所著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，也不全靠鲁迅、胡适两位学术大师的崇高威望。

首先，天启《淮安府志》的资料真实可信。

天启《淮安府志》书前《淮安府新志纂辑姓氏》纂修人一共罗列了16人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官场中的头面人物，只有位居最末的杨时蕃、唐缙修、刘一诏三人是普通生员。但根据高登龙的《淮郡新志序》：“是志也，托始终于东平宋公，总裁于知常方公，载辑则杨生时蕃、唐生缙修、刘生一诏。”明确告知我们，实际参与此项工作的只有五人。其中，宋祖舜时任知府，主要贡献应是行政协调，类似于现在的地方志编委会主任。方尚祖时任东河船政同知，主要贡献应是全书的统筹与最终审定，类似于今天的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或志书的行政性主编。杨时蕃、唐缙

修、刘一诏的职责是“载辑”，即负责资料的搜集和志稿的撰写。亦即，从纯业务的角度看，志书的基础性工作是由杨时蕃、唐缙修、刘一诏三人完成的。而杨时蕃时为淮安府儒学廩膳生员，唐缙修、刘一诏都是山阳县儒学廩膳生员。就人际关系而言，他们和吴承恩是同乡。就人书关系而言，他们是以本籍人之身编纂本地府志。就人时关系而言，他们是当代人编纂当代志。如果仅从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这件事来看，我们不妨说杨、唐、刘三人是事件的亲历者、历史的见证人。他们编纂淮安府志时，吴承恩去世只有四五十年，说不定他们中有人见过吴承恩的“真身”。即使“未见其人”，也一定对吴承恩的生平事迹耳熟能详。出自这样一群人之手的志书，其资料的真实性当然无可置疑。

另一方面，在古人心目中，只有诗词歌赋等才属于文学作品，而小说则无异于“地摊文学”，因而地位一直比较低。早在先秦时期，《庄子·外物》就说：“饰小说以干县令，其于大达亦远矣。”把小说看成是浅琐的无根之谈，根本没有资格和高雅的“大达”之辞相提并论。《论语·子张》一方面肯定“虽小道必有可观者”，一方面又说“君子弗为也”，对小说等“小道”也不屑一顾。东汉哲学家桓谭在其《新论》里说：“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，近取譬喻，以作短书。”对小说仍然抱有偏见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序》论古代艺文，共列九流十家，小说排在十家中的最后一家，并特地说明：“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”干脆将小说排除在外。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，我国古代小说始终难登大雅之堂。扬善是地方志的古老传统，有的修志者甚至不惜强拉名人壮声色。但在小说地位低下的明代，天启《淮安府志》的纂修者决不会做出超出时代局限的举动，硬要把并非本地人撰著的《西游记》当成“潜力股”收入书中。唯其如此，书中有关吴承恩著有《西游记》的资料才更加客观与真实。

其次，《西游记》所使用的基础方言是带有鲜明淮海色彩的江淮方言。一些学者以书中的一些方言词语为例，证明作者是江南人。另有学者以书中的另一些方言词语为例，证明作者是江西人，等等。对此，颜景常先生《古代小说与方言》指出，语言是发展变化着的事物。《西游记》成书到现在已超过四百年。我们不能因为在某地找到了一些和小说相同的现代方言词，就认定它们属于同一个方言，从而判定小说就是这个地方人所写的。争论几个实词出于什么方言不

能解决什么问题,准确认识书中的基础方言才比较科学。颜先生通过对《西游记》诗词的押韵,亲属词、称谓词及别字的使用,特殊的状谓结构、中古灰韵字和全浊声母上声字的读音等的系统研究,判定《西游记》的基础方言是江淮方言,从而间接认定作者是生活在江淮方言区的吴承恩。论据非常充分,论证非常严密,结论非常有说服力。

再次,在《西游记》早期版本中,陈元之的《序》对小说作者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。该《序》说:“《西游记》出于藩王府。”据吴国荣《射阳先生存稿跋》:“射阳先生(指吴承恩)髫龄即以文鸣于淮,投刺造庐,乞言问字者恒相属。顾屡困场屋,为母屈就长兴卒,又不谐于长官,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。”出土文物也证明,吴承恩棺木上确有“荆府纪善射阳吴公灵柩”字样。而吴承恩曾任湖北荆王府纪善的经历,与陈《序》“出于藩王府”的记载完全一致。《西游记》主人公孙悟空的原型为淮河神猴无支祁,花果山的“原产地”在今连云港(花果山在古代曾名郁洲、瀛洲、苍梧山等),这些淮海地缘特征也无不和《西游记》“无缝对接”。诸如此类,前人对此讨论多多,这里不再赘述。

六

近年以来,一些学者在《西游记》作者的研究上似乎又发现了“新大陆”。经他们“考证”,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或者为丘处机,或者为朱鼎臣,或者为李春芳,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,就是跟吴承恩“没什么事儿”。这些“新见”有两个共同的特点,一是否定吴承恩对于《西游记》的著作权,二是都缺乏有力的证据,无一不是主观臆测的结果。两个意见密切相关,前者是因,后者是果。而否定吴承恩为《西游记》作者最为有力的“证据”,便是天启《淮安府志》只说吴承恩著有《西游记》,并没有提到该书的性质,即《西游记》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,是不是描写了神魔鬼怪。既然天启《淮安府志·艺文志》里没有明确交待,那对不起,吴承恩的作者身份必须剥夺。

诚然,古代艺文志或经籍志的著录惯例,是按照四库分类法进行著录,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到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等等无不如此。以《四库全书》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为例,先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,经部以下再分易类、书类、诗类等,史部

以下再分正史类、编年类、地理类等,子部以下再分儒家类、兵家类、小说家类等,集部以下再分楚辞类、别集类、总集类等,然后再分门别类地著录相关的著作。按照这样的著录模式,《西游记》如果归入史部地理类,其性质则属于游记。如果归入子部小说家类,其性质便属于神话小说。但这样的分类法通常只适用于史书、规模宏大的丛书或工具书,并不普遍适用于收录范围较小的地方志。一般府州县志的记述范围有限,按照这样的分类法著录境内的著作,很可能有些类目的著作连篇累牍,有些类目的著作只能“开天窗”。所以府州县志通常的做法并不以著作的性质为标准,而是以著作的作者为标准,凡是同一个作者的著作一律收录在他的名下。而且,历代地方志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在收录书目时,收录要素通常只有书名、作者两项,或书名、作者、卷数三项,并不包括著作的性质。至于书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,更不会涉及。这大约因为,方志艺文志收录的对象只是书目,而不是书籍的内容提要。对此,只要一翻旧方志即可一目了然,不必多费口舌。如果一定要以此为据来否定吴承恩的作者身份,那真有点强人所难,让人无言以对了。

《西游记》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,有关其作者的话题当然是中国人最有发言权。吊诡的是,否定吴承恩为《西游记》的作者,掀起《西游记》作者之争最初虽然是从国内发端的,但形成“世纪之争”浪潮却是在日本与海外其他地区,然后又回溯并波及到国内。平心而论,在目前可以证明《西游记》作者的各种选项中,得力于一部天启《淮安府志》,吴承恩的“申报材料”是最为硬气的。在没有确凿新材料佐证以前,毕竟“吴承恩说”最为可靠、最为科学,一时难以撼动。那么问题来了:一方面,天启《淮安府志》白纸黑字,铁证如山。一方面,却是视而不见,深文周纳,非要挖空心思,凭空杜撰出五花八门的“新见”。这不能不让人们怀疑,难道这一话题外国人真的比咱中国人还要高明?还是有什么“黑幕”与猫腻,如同不承认夏商周断代工程,硬说孔子、李白是韩国人,企图以此来混淆视听,扰乱阵脚,进而动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,削弱中华文化的软实力?但愿这只是笔者的杞人忧天、庸人自扰。